

批林批孔文章选编

——儒法斗争与我国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 二 集)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批林批孔文章选编
——儒法斗争与我国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集)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65千字

197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0,500

统一书号：14048·3427 定价：0.20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出版说明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为了紧跟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我们在编辑出版《批林批孔文章选编——儒法斗争与我国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一集后，编辑了这本第二集。

第二集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论述儒法斗争与我国医药科学技术发展关系的座谈会纪要、文章；第二，是革命大批判文章；第三，是介绍法家和具有法家思想的医药家及其主要著作的参考资料。

这些稿件是在有关单位党委领导下，采取三结合小组方式，集体编写的有观点、有分析的文章，对今天在医药卫生战线深入批林批孔具有参考价值。其中对个别历史上的医药家（如金代的刘完素），是法家还是儒家，虽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认为，在批林批孔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倡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讨论，是符合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针~~对~~性的。发展这种讨论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研究几千年祖国医药学的宝贵财富，探讨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深入的关键。我们要遵循“古为今用”的

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孔孟之道，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我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本书的编辑工作中，一定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希望广大工农兵群众、赤脚医生、工人医生、卫生战线各级干部和专职医药卫生人员，提出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卫生出版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十月

录

儒法斗争对我国历史上医药学的影响(座谈纪要)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教育局联合报导组..... 1

我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天津南开医院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理论小组..... 14

略论法家路线和我国古代医学.....
.....中共江苏省高邮县委宣传部吴庚元 陆建华
江苏省高邮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王琦..... 40

批判《医学三字经》中的孔孟之道.....
.....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理论小组..... 52

参考资料(一)

——法家和具有法家思想的医药学家及其主要著作

介绍..... 58

扁鹊.....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室供稿..... 58

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
.....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室供稿..... 60

武则天和新修本草.....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理论小组供稿..... 63

刘禹锡和他的《传信方》.....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供稿..... 67

沈括和他的《沈氏良方》.....卫中..... 69

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理论小组供稿..... 72

吳有性和他的《瘟疫论》·····	
·····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室供稿·····	76
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	
·····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理论小组·····	79
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	
·····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理论小组·····	85

儒法斗争对我国历史上 医药学的影响

(座 谈 纪 要)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教育局联合报导组

自治区卫生局和教育局于八月十六日、十七日在南宁召开了“研究医药学领域里儒法斗争座谈会”。座谈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历史上医药学的影响，深入批林批孔，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促进教育卫生革命的胜利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参加会议的有各医学院校和区、市医药卫生单位的代表，以及自治区、南宁地、市有关部门的同志。在会上发言的有工人和工农兵学员，有革命教师、医生和科技人员，还有革命领导干部。与会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以及“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座谈了一些对医学有较大影响的法家人物、著名的医药学家、医学著作或重大的历史事件，阐明中国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而不是“天”、“神”、“圣人”发明的；研究了法家对医药学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及共局限性，揭露批判了

儒家反动思想对医药学发展的阻碍和破坏。

会上，大家用事实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儒法两家对医学的影响，说明医药学的发展，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阐明医药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医药学起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 《黄帝内经》并非“黄帝”之作

关于知识从何而来，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来就有不同的回答。“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国历史上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老二鼓吹“生而知之者上也”，儒医宣扬“医源于圣人”，《医学三字经》开头就说：

“医之始，本歧黄”。历代崇奉孔孟之道的腐儒庸医，都把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看成医学的起源，说成“圣人”黄帝之作，将它加以神化，并掺入不少儒家“天命观”、“天人合一”等唯心主义思想，使医学理论脱离实践，脱离劳动人民，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事实上，“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医药科学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黄帝内经》一书，不过托名为黄帝、歧伯的作品。在《内经》成书之前，医学发展已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根据近代考古学的发掘研究，我国在大约五十万年以前已经有了人类，且已学会了用火；到十万年以前，有了带孔的骨针；约五千年前已会饲养家畜和种植农作物。古

代人民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和应用草药治病；从用火、烤火当中逐渐发展了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时找到针刺疗法的前身——砭石作为治疗手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药学才逐步达到较高的成就。只有随着国家的统一，文字的统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医学家才有条件把前人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概括，逐步产生出《内经》这样的古代医学经典著作。《内经》一书，并非一时一人之作。

历史上有成就的医药学家，有的本身直接来自劳动人民；有的在劳动人民的推动和法家思想的影响下，重视并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有价值的医学著作，都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秦越人（扁鹊），就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民间医生。邯鄲人需要妇产科医生（带下医），他就为妇女治病；秦地群众需要他为小儿治病，他又以小儿医闻名。被《后汉书》称为“乞食人间”的名医涪翁，原系涪水附近一位以钓鱼为生的老翁，是一位热心为群众治病又不肯说出自己姓名的民间医生，群众尊称他为“涪翁”。著名的清代医学著作《串雅》内、外篇，是赵学敏整理了被统治阶级和儒医歧视的民间走方“铃医”（串铃医）的经验，并以“雅”名之，书中记载了许多群众使用的疗法和单方、验方，很有实用价值。这都说明人民群众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是医药学的源泉，而宣扬“死生有命”，自己病了便求之于“祷”的孔老二及其反动儒学，则一直是祖国医学的桎梏。

二、秦始皇崇法反儒、统一中国， 促进了医药学发展；而奉行儒家 路线的统治者和儒生造成 医书的大量失传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封建割据，使医学发展受到阻碍，东方的砭石疗法，南方的针刺技术，西部的药疗，北部的灸法，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传播。秦始皇崇法反儒，厚今薄古，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统一了中国，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地的医疗技术得以交流，分散的实践经验得以逐步综合，上升为理论，不仅为《内经》的整理、充实创造了条件，且为其后的《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其他早期医药古典著作的编写打下了基础。秦王朝重视医术，改革了医事制度，设太医令、丞和侍医等职，医生的分工和医学的分科，也较前有了进步。当时的公共卫生设施已有了一定发展，有的城市已开始有了下水道。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重视自然科学，“焚书”时只焚了民间私藏的儒家反动著作，“所不去者，医药……种树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那时有医经七家，共二百一十六卷；医方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东汉以后，除一部《内经》外，其余医书都逐渐失传，这是奉行儒家路线的东汉统治者和儒生们造成的恶果。最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医书竹简二百枚，文体与《黄帝内经》相似，据推测可能与失传的《黄帝外经》有关；此外，在十二万多字的帛书中，《医经方》即达一万多字，这又一次证明：西汉时期仍有大量医书存在。

三、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战斗的 无神论，为医药学上抵制反动 儒学的渗透提供了思想武器

东汉前期著名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王充，坚持战斗的无神论，坚决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基本特点的汉儒思想，为反对和抵制反动儒学对医药学的渗透，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王充著有一篇有关医学的著作《养性书》，可惜已经失传；但从其名著《论衡》一书，仍可看到许多有关医学的精辟论述。他认为，人之所以生存，不是靠“天命”，而是靠“精气”；能够产生精气的是血脉，人一死，血脉就干了，精气也就灭了，身体腐烂化为灰土，怎能变成鬼呢？！他指出，人之所以生病，并不是什么鬼神作怪，也不是什么“天命”；致病的原因有风、湿、寒、饮食等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血脉，才使血脉不和而得病。王充认为，生了病就应该找医生看。医生看病要找到病的根源，用药物或针灸治疗。但药物只能治病，不能使人长生不老。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家张仲景，在疫病流行和农民反抗压迫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与讖纬神学的斗争中，总结了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经验，写成一部包括理、法、方、药的临床医书《伤寒杂病论》，为中国医学的“辨证施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东汉末年杰出的民间医生华佗，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热心为劳动人民治病；他反对崇古复古，重视群众经验；他不信天命，不信神鬼，主张积极锻炼身体，预防疾病，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的动作姿态，创造了“五禽戏”；他创用“麻沸散”作麻

醉剂进行外科手术，对今天我们研究中药麻醉仍有重要启发。

四、王安石变法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 医学教育的改革，沈括在参加革新 政治过程中对医学作出了贡献

列宁指出：“王安石是中国 11 世纪时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他旁通医理，关心医学。他自己说过：“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在变法革新的过程中，王安石注重改革教育，设置了武学、律学、医学等实用科学，改革了太学，新设了太医局（即医学院），分为方脉、针、疡三科，实际上包括了十三科的诊断和治疗。有学生三百，一面学习，一面看病，还建立了病历档案，以便研究、考核。我国历史上的医学教育机构，早在五世纪即已开创，到隋唐时代已有相当发展。但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医生也被看不起，使医学教育日渐衰微。王安石变法恢复并发展了在将近三百多年间几乎濒于中断的医学教育，为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作出了一定贡献。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在医药方面也采取官卖制度，打击了药商，便利了人民。当时政府广设医院“安济坊”，创办门诊部“卖药所”（“和剂局”）。王安石本人对阴阳五行学说作了一定的阐发，批判了儒家对它的篡改和歪曲，对祖国医学也有积极的影响。

在王安石的直接影响之下，我国十一世纪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积极参加变法革新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对祖国医学也作了一定贡献。沈括既是一位法家，同时又是医家。他从

人民群众中收集了许多“目睹其验”的验方，其来源，“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凡是他“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无不求访”，编著了《良方》一书。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有大量关于医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他极力反对儒家思想对医学的束缚，指出旧医家有“药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机械规定一个方子要按一味君药，两味臣药的正统教条硬套，而且必须“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为使”。沈括批驳道：“此谬说也”，他指出，什么病用什么药，用多少味作为主药、辅药，要根据具体情况。他以猛烈有毒的泻下药巴豆为例说：“设若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批判了渗透到医学中的儒家正统说教。沈括厚今薄古，注重实践，重视群众经验，主张对前人的医学著述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反对迷信书本，迷信古人。他对当时一般儒医把长期辗转传抄的《神农本草经》中误漏之处，也盲目奉为金科玉律的状况尖锐提出批判，指出这部书“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不知也”，并根据科学实践，作了不少重要的订正。

五、李时珍打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的儒家教条，总结群众经验， 写成医药名著《本草纲目》

李时珍是我国十六世纪卓越的医药学家，他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毅然摆脱“学而优则仕”的精神枷锁，弃儒学医，打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多年在民间行医，长期上山采药，历访湖广等地，向人民群众请教，例如，萍、荇等几种水生植物，前人没有区别清楚，李时珍在农民

的帮助下加以弄清；关于鱼类生活、繁殖状况，他依靠渔民得以了解；各种矿物药品的采集和冶炼，也是依靠矿工的帮助获得解决。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医疗经验，收集民间单方、验方，发掘新药如三七、曼陀罗花等，积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在群众的帮助下，集药物学之大成，写成中外称誉的医药学名著《本草纲目》。他以反潮流的精神，对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提倡的“服石”、“炼丹”、搞“长生不老”的迷信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历代“本草”（药物书的通称）的谬误之处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以“丹药”中含的水银为例指出：“本经言其久服神仙，……《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本草纲目》系统总结了十六世纪前我国劳动人民在医药学上的丰富知识，全书一百九十万字，计五十二卷，共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方一万多个，插图一千多幅。它不但是重要的药物学巨著，而且是我国矿物学、化学、动植物学的重要科学历史文献。明以前的“本草”书多囿于儒家“性三品”的正统思想，按上、中、下三品把药物分为三等：“上药养命以应天，中药养性以应人，下药治病以应地”。李时珍大胆采用植物、动物、矿物分类法，“析族区类”，把每味植物药品按产地、苗、花、萼、实、根、气味加以区别，比西方植物分类法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一个半世纪。奉行儒家路线的明代统治阶级和当时的一般孔孟之徒，对于这样一部科学巨著，却十分歧视，以致出版遇到很多困难，直至李时珍死后三年才由私人印行，后经民间辗转翻刻才遍传全国，一六〇六年传入日本，不久又先后被译成拉丁、法、日、朝、德、英、俄等文字，流传于世界。

六、清代王清任冲破儒家封建伦理观念 的桎梏，对解剖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朝统治者大搞“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清代儒家大肆鼓吹复古，宣扬唯心主义；一般儒医则把古典医经奉为“天经地义”，不管精华糟粕，只能抄袭，不准批判。王清任向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封建伦理观念挑战，亲自到义塚、刑场观察尸体脏器，并虚心向作人請教人体器官结构，前后历时四十二年，总共观察尸体一百多具，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其他有关医学论述，写成《医林改错》一书，对前人书籍中的谬误作了不少重要的改正。他根据解剖学上的实地了解，指出：“灵机在脑”而不在心，并说明“两耳通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两目……所见之物归于脑”，批判了儒家“谈道德言性理也未有不言心者”的荒谬，指出了世俗儒医对脏腑不据解剖而凭臆断的错误。当时的儒医陆九芝咒骂王清任是“教人于髑髅堆中、杀人场上学医矣”；而王清任则公然宣称，不怕“议余故叛经文”，敢于反对儒家反动的思想潮流。王清任在解剖学方面的认识，对他的临床诊疗起了重要作用。他对心脏血管作过比较详细的观察研究，对前人的气血学说在理论上有了发展。他根据逐瘀、补气原则拟订的一些药方，如治疗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的“补阳还五汤”，治疗某些痛经、崩漏的“少腹逐瘀汤”等等，经后世医家证实确有疗效，至今仍为许多临床医生所采用。本来，我国医学史上，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内经》即有人体构造的记载，宋代还出现了解剖学图谱《存真图》。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儒家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使我国人体解剖学长期以来受到严重阻碍，影响至今

仍有不少人对解剖尸体存在各种错误看法。王清任的反儒思想及其在解剖学上的成就，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批判孔孟之道， 在医药卫生上采取一系列进步措施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他们捣毁孔丘的牌位，烧毁孔孟的妖书，排除清朝陈腐的医学设施，在医药卫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即出示召请医生、号召“凡有精通医理，能治各项病者，即宜应命前来”，积极地把当地医生组织起来。当时有很多民间医生都应召前往参加工作，其中较著名的医生如李俊良先后治愈太平军的将领多人；如黄益芸则善于应用中草药治病，适应军队打仗的需要。在政府和军队中，太平天国建立了卫生组织：中央政府中设有国医负责掌管卫生工作；各军设有恩掌检点督医将军，下设内医、掌医等职。天京设有总药库，还兴办医院及疗养院。伤病员均由各军的医生先以草药敷裹处理，然后再送医院和疗养院继续医治和疗养。太平天国对城乡卫生都比较重视，天京城内设有“老民残废馆”，收养跛、盲、聋、哑、老残，并让他们量力打扫街道，维持公共卫生；在乡村则设乡兵，负责管理和洒扫街渠，保持清洁卫生。此外，还运用政权力量，颁布法令禁止抽鸦片、缠足、娼妓、溺婴、酗酒等社会陋习。这些进步措施对人民的卫生保健作出了贡献，反映了农民革命运动在进行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革命，为其政治、军事路线服务。